

我校举办“学习《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座谈会



▲ 座谈会现场

【聚焦媒体】

粤港澳大湾区：创建宜居宜业宜游的人文湾区(节选)

答问专家 陈春声(中山大学党委书记、粤港澳发展研究院院长)

光明智库：《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提出“增进香港、澳门同胞福祉”，并设专章谈“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网友普遍关心：打造优质生活圈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有何重要意义？三地居民将迎来哪些利好？

陈春声：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是新时代“一国两制”伟大构想付诸实践、成功实践的重大民心工程，是实现国家战略、推动经济增长与惠民工程的具体体现。打造优质生活圈，是坚持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具体体现，能让湾区人民更好地共享发展红利，有利于增强港澳对大湾区建设的认同。同时，在发展中改善民生，让粤港澳人民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有利于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加快形成大湾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

打造优质生活圈为三地居民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第一，目前港珠澳大桥和广深港高铁已通车，未来随着三地基础设施和交通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形成“一小时生活圈”，三地居民工作生活的空间距离将不断拉近；第二，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引擎，湾区内经济快速发展，尤其是科技创新活力涌现，将带来更多高端的就业岗位，这也将大大拓展港澳居民的发展与社会阶层流动空间，让港澳居民搭上内地发展快车，尤其是为港澳青年创新创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工作机会、更好的居住条件；第三，打造优质生活圈标志着更高标准的生态环境、生活质量，湾区内环境治理、城市治理的能力水平不断提升。湾区内大气、水资源、食品安全方面的协防共治、河涌、湿地、森林、滨海等生态景观交相辉映，绿色、智慧、节能、低碳的生产生活消费方式将成为时尚，湾区

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光明智库：有网友问，制约大湾区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现在还有哪些短板？未来应在哪些方面重点发力，提升湾区整体文化内涵？

陈春声：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内已具备宜居的重要基础。但也要看到，在宜居的硬环境不断改善的同时，也存在着影响大湾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一些短板，其中最重要的是“软环境”的打造。湾区中内地城市的国际化和法治化环境建设尚有较大发展空间。只有通过建设国际化和法治化环境，在城市建设、公共服务、环境保护等方面与国际接轨，建立更高标准食品药品安全质量标准体系，不断增加优质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不断推进社会协同治理、提升治理水平，打造稳定安全公共环境，培育丰富包容的文化形态，建立高品质的湾区生活环境和国际化的生活社区，才能进一步提高对全球资本、人才、机构的吸引力和集聚力。

提升整体文化，推动文化湾区建设可在以下两个方面重点发力：一是着力建设学术高地和文化高地。要进一步增强传统文化、岭南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对接，通过粤港澳之间的交流、碰撞，促进学术创新和文化创新，形成粤港澳共同的学术圈，打造学术高地和文化高地。二是营造大湾区整体文化氛围，通过体育、艺术、民俗传统、饮食等湾区居民容易接受的方式，建立常态化的文化交流机制，联合建立行业或专业联盟，诸如大湾区体育赛事联盟、粤剧戏曲联盟、影视合作基地等，让文化充分滋润和促进湾区健康发展。

光明智库：正如大湾区宣传主题曲《共同家园》

中唱道：“角色不同演好自己的未来”“推开心窗的世界更大”，网友们想知道，应如何更好发挥大湾区文化优势，更好展现大湾区文化魅力？

陈春声：粤港澳大湾区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各个区域文化千姿百态，差异很大，但都表达着自觉的中华意识以及对国家的认同。大湾区三地在语言上相通，文化上同宗同源，人员交流非常频繁，尤其是晚清以来，许多商人自然而然地来往于广州和港澳之间。三个地区也都是中国比较早向世界开放的地方，是西方科技与文化较早登陆的地方，历史上这些外来的文化丰富与发展了大湾区的地域文化，显示出大湾区的包容性。对大湾区的区域史研究告诉我们，包容性与外向性，并未改变大湾区文化的中华特色与中华意识。

弘扬中华文化，要结合大湾区的历史与文化语境来说，不能只是抽象地谈。这就要求我们通过深入的区域史研究与人类学研究，发掘、了解大湾区的区域历史过程与文化遗产，切实了解地方百姓的观念与心态，这样我们才能够切实有效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充满大湾区特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另外，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文化交流交往的鲜明优势。香港是中西文化交汇的国际大都会；澳门葡语文化优势明显，与“一带一路”沿线葡语国家文化融合、联系密切；湾区还汇集了众多侨乡。因此，粤港澳三地要加大合作，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大力推动文化创新，积极开展文化交流，打造文化湾区的品牌，合作开展“一带一路”文化交流，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转载自《光明日报》2019年2月22日第7版，记者/王斯敏、张胜、姚同伟)

规划有广度深度高度温度

在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教授张光南看来，《规划纲要》是一部具有“广度、深度、高度、温度”的纲领性文件。

“我们从《规划纲要》看到了从点到轴、从轴到面的空间布局，从基础设施到综合枢纽的升华，从经济领域到民生领域的转变，从创业到创新的过渡，从粤港澳辐射全国、从国内辐射‘一带一路’的视野路径，等等，无一不体现着广度。”张光南说。

同时，《规划纲要》从空间布局、科创中心建设、基础设施联通、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生态文明建设、优质生活圈建设、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合作发展平台共建等方面形成一个逻辑构架，这体现了实现湾区建设发展的思维“深度”、策略“深度”。

此外，《规划纲要》从定位的高度、战略的高度，彰显了大湾区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张光南说，过去粤港澳的合作更多是在投资方面、产业方面的合作，政府之间的合作，体现的是“惠商”。而《规划纲要》大篇幅都与“惠民”相关，比如建设人文湾区、休闲湾区、健康湾区等内容，这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温度”。

(转载自《羊城晚报》2019年2月22日第A03版，记者/王倩)

中山大学智库专家解读《规划纲要》——大湾区将讲出新的“春天的故事”

2月21日，国家高端智库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广东省重点智库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粤港澳大湾区体制机制创新研究”重大课题组召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专家解读学习座谈会，对《规划纲要》的亮点、大湾区建设的机遇与挑战进行分析解读。与会专家认为，大湾区发展的关键就是创新，创新的关键又在于制度创新，如果能在制度创新上实现新突破，大湾区将讲出新的“春天的故事”。

打造原创科技成果发源地

中山大学副校长、中大自贸区综合研究院院长李善民认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规划纲要》提出的重点任务。粤港澳大湾区必须建立国际最高标准，成为全球科创资源的集聚地，成为原创性科技成果的发源地。

大湾区是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的条件下建设的，这在国际上没有先例。因此，李善民认为，必须深化体制机制创新，首先必须逐步消除大湾区内部的人才自由流动的体制障碍；二是破除科技创新资金的合理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解决内地科研经费在港澳使用的问题；三是科研设备与耗材、数据流动问题。

李善民还特别提到了教育的发展。他说，在粤

珠江西岸迎来重大机遇

中大地理规划学院教授李立勋从空间角度分析了纲要出台后可能给大湾区带来的新机遇。他认为，《规划纲要》的出台将引发大湾区空间结构的重组和资源新配置，如珠江西岸等地将迎来重大发展机遇。

李立勋认为，随着大湾区的建设，珠江西岸迎来了交通基础设施的大发展，同时香港产业经济发展与珠江西岸的互补性强，未来可能和西岸的合作会更多。“在香港‘西进’的过程中，势必会给珠江西岸地区带来重大发展机遇。”

李立勋说。大湾区未来空间发展重点包括三个方面——发展走廊、合作平台、创新平台。其中发展走廊(空间轴带)可能包括“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建设贯通潮州到湛江并连接港澳的滨海景观公路，推动形成连通港澳的滨海旅游发展轴线。

地，需要充分整合香港、澳门与珠三角的科技创新优势，促进区域内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发挥香港、广州、深圳、澳门核心城市的作用，带动区域创新，实现区域内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共享科技创新成果。

构建新时代开放性格局新范式，引领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改革开放以来，香港和澳门在国家的对外开放中发挥了独特作用，成为内地吸引国际投资和开展国际贸易的重要桥梁。珠三角是内地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地区，形成了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随着内地企业国际投资的增加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港澳将成为服务内地“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向交流平台，在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

发挥独特作用。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确立，有利于完善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服务框架，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澳门将发挥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平台的作用，推动中国与葡语国家之间的经贸交流和合作。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地区在对外开放中一直走在前列，未来要进一步发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和珠海横琴三个自贸区的作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完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投资环境，携手港澳打造中国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国际经贸合作和国际经济治理的新平台，在国家新一轮改革开放中发挥引领作用。

(转载自《南方日报》2019年3月11日第A16版)

台等角度对《规划纲要》进行解读，并回答记者提问。

李善民副校长表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与雄安新区一样都是千年大计，而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这个千年大计的 core 任务，建设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是这一定位的具体要求，大湾区科技创新需提升原始创新、产业技术创新、区域协同创新能力，在促进制度要素便捷流动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发力。

符正平教授认为，合作发展平台的功能是从点上集中利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港澳独特优势、广东改革开放先行先试优势，实现与港澳深度合作的突破。他专门解读《规划纲要》有关前海、南沙、横琴的内容。袁持平教授专门对落马洲河套的港深创新及科技园作解读，提出构建创新中心的顶层设计体系，打破港深制度软环境落

差，深化科技合作等对策建议。

李胜兰教授指出，《规划纲要》有三个亮点，体现整体性与差异性的运作战略，突出科技创新引领湾区发展，粤港澳携手共建开放型经济体。张光南教授则认为，《规划纲要》内容丰富，体现了广度、深度、高度、温度的兼容，政策措施更加凸显“以人民为中心”、“惠商又惠民”的理念。

李立勋教授从空间规划的角度作专业解读，他表示，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在空间组织上呈现多中心、多层次、多功能、高度联系的网络体系四大特征，在空间关系导向上突出带动性、分工协同、均衡发展，并对未来的空间格局发展趋势作出相关研判。

最后，与会媒体记者就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创新要素集聚、生态环境建设及医疗、金融、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前景等问题进行提问，与会专家进行了解答。

全国人大代表、中山大学校长罗俊：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法治保障

全国人大代表、中山大学校长罗俊在发言中称，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地方立法须先行。

“相较于香港、澳门，广东在立法方面的地方权限相对有限。大湾区在建设发展中，遇到的法制壁垒问题不全然要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解决。”他建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可以在不涉及国家主权的领域，赋予广东更大立法权和行政管理权，以更好实现湾区内不同法制的有效衔接。

罗俊指出，要促进高质量互联互通，法律合作须加强。他认为，促进粤港澳法律制度协调合作，是推动大湾区一体化发展、促进高质量互联互通的重要基石。大湾区要做好不同法律制度对接，首先要坚持“一国”原则，深入推进港澳社会对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认同。其次是尊重“两制”差异，充分发挥港澳对接国际规则的独特优势。再者是尽快落地粤港澳法律体系协调对接，深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合作。他表示，下一步，中大将集全校之力，依托智库优势当好“联系人”“宣传队”，重点培养一批高水平、熟悉湾区不同法律制度体系的

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

罗俊表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法律研究须强化。他称，深化粤港澳合作，共创国际经济贸易合作新优势，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是大湾区的重要定位之一。海洋经济以及支撑其发展的海洋科技和海洋人文创新，是大湾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格局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他希望，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考虑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实际需求，加强立法研究，系统推进大湾区立法工作，赋予广东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社会治理等领域更大的立法权。他还希望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结合“一带一路”建设实际需要，指导推动粤港澳法律制度体系协调合作，借鉴香港在经济、金融、贸易、社会治理等领域先进立法技术和重要立法成就，实现与国际规则的深度对接，为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提供长期稳定的法治保障。

(转载自《南方都市报》2019年3月10日第A03版，采写/吴哲、吴璇、袁萍、陈燕、符信)

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最具竞争力的国际科创中心(节选)

答问专家 李善民(中山大学副校长、自贸区综合研究院院长)

光明智库：《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提出，要“建成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有网友问，上海等城市也具备建设国际科创中心的雄厚实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创中心有何不同？“新兴产业策源地”怎么理解？

李善民：与上海、北京等城市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创中心的特色在于：国际性、产业化、创新性。

国际化，是指这里是国际一流科技资源的集聚中心。香港有多家世界级大学，基础研究实力雄厚；澳门在部分领域的科技力量走在国际前列，广州、深圳也有多所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高校院校。更为关键的是，香港实施国际自由港政策，拥有健全的司法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能够吸引世界一流的科研人员和科研机构。同时，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各类科研资金募集、顶尖科研设备入境等非常便利。

产业化，因为在这里科技成果转化迅速。大湾区是世界最具活力的创新区域之一，产业链条完善，配套产业齐全，还拥有丰厚的科技创新链中端资源。香港、广州的高校院校和科研院所存在科技创新链前端积累了大量的技术和专利成果，深圳已是国际科创成果的孵化基地，香港可提供广阔的投融资平台，珠三角有强大的制造业能力，这些都让大湾区拥有广阔的科技成果转化市场。

创新化，这里是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的绝佳试验田。粤港澳大湾区除了“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的制度差异，还有科研经费过境、人才跨境流动、税收、知识产权保护、高校合作、科技体制等障碍。解决了大湾区的科技合作障碍，就是为全国其他地区乃至国际科技合作给出了行之有效的思路。粤港澳大湾区内拥有3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可以以自贸试验区为平台大胆推进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服务国家创新大局。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创中心对于我国科技强国具有独特意义，尤其是中美经贸摩擦发生以来，我们更加意识到“卡脖子”的核心关键技术的重要性。《规划纲要》提出，要“建成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题中之义在于，中国不能再走模仿创新、跟随式创新的道路了，必须要有引领性的创新，我们的产业发展也要摆脱旧有格局，在新兴产业上发力，实现“弯道超车”。但科技创新不能闭门造车，必须面向世界、紧跟前沿。因而，国际科创中心必须是开放性很高的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无疑是国内现阶段最符合这一条件的区域。

光明智库：吸引和对接全球创新资源，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才能始终站在国际科技前沿。网友们很关心，粤港澳三地科创资源各有什么优势，应怎样优势互补，增强吸引

世界创新资源的能力？

李善民：对于大湾区内部而言，要强调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是一个整体，强调竞争与合作，搭建各个创新主体之间交流合作机制。首先，不同于纽约湾区和东京湾区的单一核心城市格局，粤港澳大湾区多中心格局避免了谁当“龙头”的争论，促进城市之间良性分工，既充分竞争也加强合作。其次，围绕产业链，构建创新链，形成了以市场为纽带联结的“官产学研用”一体化组织形式。未来应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企业为主体配置科技创新资源，政府则应优化研发投入和做好服务工作。

对于大湾区外部而言，关键是怎样更好吸引国际科技创新资源。要打造与世界级创新湾区定位相适应的科创平台，组建国际级的科研队伍，吸引全球科技资源，多力量共建世界级创新区；要突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门类齐全、商业环境好，能够辐射内陆腹地巨大市场的优势，进一步发展“飞地”模式，并依据“正面清单”有针对性地吸引国际高科技企业入驻；实施自由贸易港、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离岸科创”政策，吸引国际科技创新资源；利用好湾区狭长的海岸线资源，布局一些世界级的研发机构总部和创新团队。通过优美的人居环境，激发创新型人才的创作热情，从而建成世界级创新团队的向往之地。

光明智库：创新基础能力建设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是建设科创中心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加强创新基础能力建设、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建设，有哪些已经见效的政策措施，未来还应怎样推进？

李善民：在创新基础能力建设方面，已有一定成效：广深港科技走廊建设正在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澳门已获批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广州和深圳拥有30余家国家重点实验室。粤港澳大湾区正在建设形成空间分布上集聚、学科方向上关联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创新集群；打造了多个高水平科技创新载体或平台，科技创新基础设施正在发挥集群效应和团队效应；培育科技创新联盟或协同创新共同体。在中山大学的倡导下，包括香港9所大学在内的28所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共建粤港澳高校联盟，目前又成立了粤港澳超算联盟、粤港澳空间科学与技术联盟、粤港澳海洋科技创新联盟等。

未来需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增强湾区发展的核心能力；明确广深港科技走廊建设具体合作机制和推进细则，并促进科技走廊与其他湾区城市的链接；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任务为核心，加快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湾区的布局建设，形成区域协同创新和联合攻关的辐射源；建设科技创新联盟或协同创新支持体系。

(转载自《光明日报》2019年2月21日第7版，记者/王斯敏、张胜、马丹)